

台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

「台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已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七、十八兩日，在南台灣的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完畢。該會係由臺南市政府、成大歷史系合辦，並獲行政院文建會、臺南市奇美文化基金會贊助。會中共宣讀十八篇論文，由於時間的限制，主辦單位遂有甲、乙場地分區同時進行的安排，而使與會論文的題材，在各單元呈現明顯的主題性，尤其以歷史學與建築學的結合、原住民歷史活動的探討為最大的特點。

為會議揭開序幕的兩篇論文，分別是莊吉發先生的清代閩粵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台灣秘密會黨的發展」和丁煌先生的「台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家世為中心之記述）」。前者主要以清代檔案作資料基礎，作者從中發現閩粵地區強宗大姓對小姓的凌壓，是促使異姓結拜、彼此連合，以抵制大姓行動的社會經濟背景，其並進一步轉化而為秘密會黨的濫觴。由於該地區嚴重的人口壓力，導致青壯人口大量偷渡台灣，所形成性比例及年齡結構極度失調等移墾社會特質，即秘密會黨能在台灣迅速成長的原因。動盪不安的社會，提供秘密會黨多元發展的空間，待同治中葉以後，台灣社會已漸趨整合，分類械鬥事件減少，結盟拜會亦不盛行，會黨案件便屬罕見了。後者則以籍居台南市的陳、曾兩姓天師派道士舊家為對象，透過田野調查訪得的家譜資料，重建其家族世系表，並描述兩家以道士為業的活動概況及其對台灣道教發展的影響。文中另對法國學者施博爾在台灣蒐集道教相關資料的作為，語多批評；全文頗用心於呼籲相關資料發掘保存的重要，也強調訪談、抄錄對研究工作實具有參考、補強的意義。

台灣中華會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代初，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始解散，是日據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華僑綜合性團體。吳文星先生「日據時期台灣中華會館之研究」一文，即利用該會館現存的部份出版品、官方資料和報章雜誌中的相關報導，討論中華會館的創立背景及組織發展、演變的經過；作者透過對該會館重要活動的通盤檢討，發現它並非純粹的聯誼性團體，實亦深具社會運動團體的性質，且得到台人社運團體和個人的支持、聲援。只是，在環境和制度的限制下，其對台灣社會所推動的各項事業，成效均不大，而未能獲得高度評價。以上為日據時期在台華人的活動與困境之研究，鄭梓先生的「復台前夕祖國派台籍人士的最後言論與主張——以『台灣民聲報』為中心之初步分析」，則為探討在華台人對「收復台灣」輿論形成貢獻的專論。民國三十年二月十日，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重慶成立，幾乎所有不同陣線的台人抗日團體皆來加盟，上千名的台籍精英，努力規劃復台、治台的言論，其具體的實現即為機關報「台灣民聲報」半月刊。作者將「台灣民聲報」的建言依一九四五年七月作階段性的分劃，從之前積極、理想、熱烈的討論，到之後失望、擔憂的呼籲，忠實的把史料排比陳列出來，以呈現祖國派台籍人士面對時代劇變的一片無奈。

高志彬先生對台灣方志素有鑽研，「清康熙朝台灣府志創修考」即其綜合各家資料、考察府志纂修疑惑之作。作者從「台灣志稿」、「台灣郡志稿」、「福建通志台灣府」、「台灣郡志」、「台灣府志」（蔣纂）、「台灣府志」（高纂）諸志的纂修經過、內容及流變、版本等面向，將康熙時期台灣府志修輯的整個過程，作了重建的工作。陳炎正先生的「難得一見的台灣縣采

訪冊」一文，則首先對光緒十三年台灣縣的建置過程作一簡單的回顧，再將「台灣縣采訪冊」的編纂背景、撰寫人員與原稿如何散失、內容為何等情加以陳述，藉以肯定該書在文獻上的價值。

石萬壽先生所撰「明鄭時期台灣漢人的墾殖」一文，重點置於一六六二年鄭成功登台至一六八三年鄭克塽投降這段時期上；此因該段時間是漢人在台墾殖的開始，並構成清代台灣開發的基礎，地位特別重要。營盤田、官田、文武官田，為明鄭時期漢人墾殖的三種形式，作者全文即在考訂其形成的歷史過程暨主要分佈地帶，以做為今人索驥的參考。至於張守貞先生，則以「康熙領台時期鳳山縣治設置問題探討」一文討論鳳山縣治的歷史沿革。作者查核史料，發現向來所謂縣治自始即設於興隆莊，實係誤會；其根據蔣毓英「台灣府志」、「康熙福建通志台灣府」所載，認為早期縣治應選定於鳳山莊，至康熙中期以後，隨興隆莊的興起，始有改設之舉。此中曲稱，後人多忽略了。

在乾隆初期，曾先後出任淡水同知，兼攝彰化知縣、汀州知府，並逝於台灣知府任上的曾曰瑛，是連橫在「台灣通史」上列為循吏的「有政聲」之官。由於相關文獻不僅記載不足，且有疏誤之處，湯熙勇先生遂以「清代台灣的循吏曾曰瑛事蹟」的撰述，從其任官的經歷到諸項事功，作一全面的省視，並對有疑誤的部份，給予修正和補充。作者在歷數曾曰瑛維護社會治安、立漢番界碑等事蹟外，且特別強調曾氏倡建彰化白沙書院，因之開啟彰化文教之風的貢獻。

葉振輝先生「安平礮擊事件前的地方交涉」一文，則是和上列諸作完全不同視野著眼的研究。作者藉中、英兩國的檔案資料，重新探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所發生的安平礮擊事件，以檢討英國領事在（一）不熟悉台灣情況；（二）未充分遵守國際公法的情形下，對該事件應負的責任；並更翔盡地梳理事件前後，英國領事與中國官員之間的交涉過程及內容，而使此一國際性事件有機會呈現其各方面貌。

孫全文先生報告的「安平聚落之發展」，係結合歷史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研究的都市史性質論文。他從荷蘭人經營都市的觀念著手，探究安平聚落在時間脈絡中的空間發展，溯源荷領時期的規模，回顧漢人社會建立以後安平地區從聚落蛻變到都市的結構因素；作者並期待有機會結合歷史考古學，在安平做抽樣性的挖掘工作，以尋找荷蘭台灣街的基礎。另一建築學者賴志彰先生，為了探討集居型態和家族歷史之間的關係，意圖了解家族成長所可能有的各種不同集居型態，而有「建築創生實踐歷程中的形式表現——以崎腳、月眉池劉姓建築組群為例」一文的研究。他認為建築與聚落在空間形式的營造上、不同空間的再生轉換上，並非一味的抄襲與模仿，而具有自己的選擇性，能結合社會性要求和形式目的，發展出適合新時空的藝術創作；崎腳、月眉池建築組群，即劉姓家族從原鄉——漳州南靖的圓樓形式，轉變為今日合院形式的最佳例證。

台灣的傳統民宅，在現代化無堅不摧的趨勢下，不是已經逐漸拆除而消失、廢棄不用而腐朽，便是部份改建而模糊了原本的樣式；此種民宅實體喪失的現象，一方面使現代人失去了了解傳統建築、欣賞古樸民宅的機會，一方面造成建築史料的流失與傳統匠師專業知識傳承的斷層。徐明福先生有鑑於此，感受到民宅史料建立的迫切性，遂以新埔地方為對象，蒐集並考證實體的、口述的與文獻的材料，且將所收資料依地方開發始末、各民宅樣本、匠師等

項目加以陳述、編輯，而有「論台灣傳統中國民宅之地方性史料——以新埔為例」一文的撰述。

由於文獻中所呈現宋元時期人文活動的資訊極為有限，是以一般認定：宋元澎湖是漁業為主、農業為輔的聚落，一如目前。陳信雄先生根據三年的實地考察經驗及所發掘的陶瓷片內容，並配合對宋元海外發展情勢的衡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宋元澎湖人文活動的特色——中國海外貿易的轉運站」文中，即再三闡述：遺留在澎湖的宋元陶瓷，依其數量、品質的龐大和精緻，皆證明它們是中國販售海外的商品，而以澎湖為對外貿易——目的地如菲律賓或埃及——的轉口站。

詹素娟先生的「岸裡社群遷移活動研究之一：麻裡蘭社與鯉魚潭關係初探」和鄧相揚先生的「平埔族古文書溯源」二文，皆是有關中部平埔族遷移、活動的研究。前者以巴宰族的岸裡社群為主題，從其原居地的考察、分佈的範圍到幾次搬遷的歷史背景，再透過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在苗栗鯉魚潭所蒐到的古文書，將焦點縮小到麻裡蘭社移動原因的探究，而提出：岸裡社群儘管在道光以後陸續搬離原居地，却仍與原社群密切來往，社與社間的從屬、連帶等互動關係依然持續，亦即岸裡社群彼此間的紐帶隨空間擴充而增大，其聯繫功能則未有本質上的改變。後文則主要在展示作者於埔里地區收集古文書的成果，其在新資料發掘的意義上，顯示了更上層樓研究的可能。由於鄧先生親密的地緣關係，向來貧乏的平埔族文獻資料，遂有出土機會。本文公開的二十八件古文書，適足以對埔里地區埔眉番的歷史活動、土地關係的形成、社群關係的內在脈絡等，提供進一步深究的路徑。

溫振華先生「天花在台灣土著部落傳播初探」一文，主要以「巴達維亞城日記」、「蕃族調查報告書」及清代方志、私人文集作資料基礎，將傳染病——天花——在土著部落傳播的概況和影響作一介紹，以試圖了解疾病與土著族群的互動關係。作者指出，天花感染對土著部落有三個影響：一為人口因之大量死亡；其二造成部落的遷徙；三是原住民由此產生強烈的恐外症，而儘量避免與外人接觸，自營孤立的生活。本文所提供的研究視角，頗具開發的潛力。「日據時期對台灣先住民族的『教化』與『同化』」一文，則是藤井志津枝先生長期對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作者認為：日本統治者視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和諧關係為殖民政策推行的最大障礙；在冀圖樹立日本人為唯一效忠中心的舉措上，首先必須分隔漢、土之間的關係，並進而以優勝劣敗的進化論，作為同化、教化原住民的理論基礎，從而希望改造原住民的精神與文化。作者對此類措施批判甚烈，行文之間，充滿為原住民喉舌的心意。

(詹素娟)

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近幾年來常以「台灣史研究」及「史料發掘」為主題，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研討會。去年十一月，該中心曾與本室合辦「台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並出版「台灣史研究論文集」。今年十二月十八日，該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協同舉行「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與會者除學界專家、教授外，並邀請各大專及中小學教師、校長參加，會場討論氣氛十分熱烈。

這次會議發表的論文共有六篇，各篇報告人及講題分別是：高志彬先生「淡水廳志纂修考——兼論『陳培桂竄改林豪底稿、修改楊浚草稿』說」；湯熙勇先生「清乾隆十六年彰化內凹莊柳樹湧之番殺兵民事件及其影響」；賴志彰先生「寫真相片作為一種意象與語言談日據時代的台灣攝影寫真發展——從霧峯林家寫真談起（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李季樺先生「清代『番兒至老而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李安和先生「從台灣天主教音樂史料中探討台灣閩南語聖歌與台灣民俗音樂的相互關係」；林會承、邱永章先生「屏東五溝水實質環境之形成與結構」。其中清代史二篇，日治時代一篇，此外，地方史論述、史料辨證、民俗音樂方面也各有一篇專文。整體而言，在論述體裁上較前亦有創新之處。

清代專文中，湯文探討台灣的司法問題，藉「乾隆十六年彰化內凹莊柳樹湧之番殺兵民事件」探討司法運作的過程和弊端，及該案對巡台御史制度、台灣通事制度之影響變革。李文則探討台灣土著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該文認為：促使台灣土著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就親族婚姻層面考察，漢人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使土著族群遭受很大的影響，而土著本身的族群意識、主觀感受，更實際影響其行動取向和擇偶意願。另一方面，其以竹塹社個案為例，指出咸同年間，社內七姓內婚制的崩潰，是竹塹地區族群勢力消長的重要指標。

日治時代論述，以賴文為主。作者在概述日據時期攝影發展的歷程之後，以霧峯林家出土的五八三張舊照片作為素材，分析背後隱含的意涵；其論文有二項特色：一是以新史料作為題材，二是以「影像歷史」方式表達，有其新穎之處。

地方史論述方面，有中原大學林會承教授及其學生邱永章的共同著作。該文欲透過屏東縣萬巒鄉境內的一個客家移民村落，嘗試用建築解析村落結構的方式，了解台灣傳統漢人村莊實質環境的形成，而提出三點結論：(1)清初漢人招墾係以「墾首制」為主，但南部六堆地區多以「祭祀公業」形態進行。(2)五溝水構成的主要體系有三：實質的防禦系統、心理防禦體系及風水體系。(3)在組織層次上，不透過固定的形式增加其認同感，而是以一年為周期，凝聚社群的力量。

史料析證方面，有高志彬先生一文。該文對同治十年刊行之「淡水廳志」纂修源流加以辨明，兼考「陳培桂竄改林豪底稿」之說並不符實，並論「陳培桂修改楊浚草稿」之舉並非不得當。

民俗音樂方面，李文以民族音樂學中的理論，就譜例、曲調風格、語言節奏、吟唱方式等方面，分析說明天主教閩南語聖歌其實富有相當濃厚的鄉土民樂風格，證明人類宗教文化的共通性與本土化的相互關係。

除論文發表外，下午所進行的「台灣史教學之現況及未來」座談會是一大特色。與會者除討論熱烈外，各級教師並就個人教學經驗提出報告，綜合結論有三：(1)就教學者本身立場，不應受政治黨派影響而自我制限，干預教學的內容。(2)就教學內容言，台灣史課程自小學至大學應作整體性規畫，由近而遠，相互銜接，期使國民具備應有的台灣史常識及鄉土認知；去除固定的思考模式，代之以更生動化的教學方式，以了解台灣現實的社會脈動。(3)台灣史研究應再進一步加強近現代史部分，及通論性著作的撰述，如此才能更加豐富教學的內容。

(李季樺)

第五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

由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的「第五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已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六至十九日，在該館舉行。會中共發表論文二十五篇，其中有三篇與台灣研究相關，特簡介如下：

陳亦榮先生所著「從族譜看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特質」，主要進行的是一地理範圍內人口遷徙的區域研究。本文以台灣為範圍，藉大量族譜資料的分析，了解島內漢人遷徙的區域特質。作者以鄉治組織——街庄為基本觀察單位，發現清代台灣漢人的遷徙過程實是一種推拉理論的表現：即災荒與械鬥所造成的遷徙，屬推力部份；而農墾與商業性遷徙則是拉力部份。在推、拉力作用之下，譜成漢人移民開發史。

黃典權先生「石井本宗族譜考索提要」一文，在介紹考證泉州同安獅石鄉和漳州南靖金山水頭的史料。石井本宗族譜內豐富的人物資料，是道光年間同安獅石鄉鄭氏族人自石井抄存的成果。該譜刊本見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之台灣文獻叢刊六十九種「鄭氏關係文書」附錄中，深受明史、南明史與台灣史研究同道所重視。

石萬壽先生「明鄭以前二層行溪中下游流域的漢移民與系譜」一文，則是區域發開史的研究專論。二層行溪位於臺南縣市與高雄縣的交界上，係全台漢人最早入墾的流域之一。本文利用田野採集而得的口碑、族譜資料，綜合文獻，分別由荷鄭時期、康熙年間等不同時間階段，敍述漢人在中下游流域的墾殖過程，並兼及上游水源水鷄潭吳氏的系譜介紹。作者獲致的結論是：清初領台，二層行溪中下游的漢移民，主要仍是泉州府同安縣人，其次是漳州府龍溪縣，再其次為漳州府長泰、泉州府晉江、南安、安溪，漳州府海澄、南靖、漳浦，泉州府惠安等縣。至於漳州府平和縣、興化府莆田縣、浙江省龍泉縣，以及浙江省各縣、客家人等，則零散點綴於漳、泉聚落中。

(洪麗完)